

朱碧莲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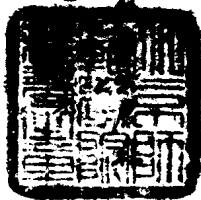
宋玉辞赋译解

宋玉辞赋译解

朱碧莲编注

中国社会

一九八七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7609

1117609

书名题字：朱东润

责任编辑：陈泽镛

责任校对：王应来

封面设计：张 明

版面设计：韩 锐

宋 玉 辞 赋 译 解

朱碧莲 编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7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190·212 定价：0.90元

2051/52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研究和重新评价宋玉及其作品的著作。《论宋玉及其〈九辩〉》、《宋玉辞赋真伪辨》两篇专论，勾稽古籍资料，分析宋玉作品，论证了宋玉的思想、人品和他在辞赋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考辨了宋玉辞赋的真伪。

考订为宋玉所作的《九辩》、《风赋》等六篇，作者所属尚有争论的《笛赋》、《大言赋》等六篇，均全部载入，逐篇作了注释，并附以译文和鉴赏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本书编注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也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

前 言

很长一个时期，宋玉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建国以来，不少同志(如胡念贻和程仁卿)对宋玉作了较客观的评价，但郭沫若先生却始终坚持对宋玉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郭先生是楚辞研究的专家，在屈原的研究上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但他对宋玉的评价却失之片面、主观。由于他的影响，在一些中国文学史专著里，宋玉受到了不应有的贬抑。我认为，以个人的好恶来随意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够慎重的，因此曾写《论宋玉及其〈九辩〉》一文，谈过自己的看法。

同样，宋玉的作品也受到了冷遇，其中个别作品虽曾得到赞赏，但在解释上却不免穿凿附会之嫌。前者如《九辩》，后者如《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屈原的全部作品早已有多种语译出版，而《九辩》作为楚辞的代表作之一，却迄未翻译。于是我有把宋玉的全部作品收集在一起加以注释、翻译，并加简析的想法。存疑的作品则作为附录收入，也加注释和简析，以便阅读比较。本书试图通过对宋玉全部辞赋的译解，帮助读者比较客观而全面地评价、认识宋玉其人及其作品；同时，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宋玉的作品提供一点方便，这样，或许可以免去翻检之劳。

拙稿承朱东润师题字，蒙万云骏教授推勉，谨致谢忱。

朱碧莲
一九八三年孟夏于上海还芝斋

• 附记:

本书作品原文根据下列版本择善而从: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 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

朱熹《楚辞集注》 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王夫之《楚辞通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 中华书局十六开本

陈第《屈宋古音义》 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章樵注《古文苑》 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壬寅刊本

欧阳询《艺文类聚》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中华书局排印本

韩婴《韩诗外传》 四部丛刊影明沈氏野竹斋刊本

刘向《新序》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翻宋本

虞世南辑、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引 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南海三十三万卷堂重刊本

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卷一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陆侃如《屈原与宋玉》引

班固《汉书·艺文志》 中华书局排印本

目 次

前 言..... (1)

论宋玉及其《九辩》..... (1)

宋玉辞赋真伪辨..... (15)

九 辩..... (25)

风 赋..... (63)

高 唐 赋..... (73)

神女赋..... (89)

登徒子好色赋..... (100)

对楚王问..... (110)

附 录

笛 赋..... (114)

大言赋..... (122)

小言赋..... (125)

讽 赋..... (130)

钓 赋..... (134)

舞 赋..... (141)

有关宋玉的传记资料..... (145)

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和文章

索引..... (149)

论宋玉及其《九辩》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

对宋玉的评价，历来都是肯定的，甚至在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笔下，常喜欢“屈宋”并提。刘勰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李白称“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杜甫则更赞“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但到了近代，对宋玉的评价却由肯定变为否定。最初是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剧《屈原》中将宋玉写成为背叛屈原的无耻文人，随后是几部文学史著作把宋玉作为屈原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否定。我们认为评价古人要有事实根据，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能主观武断，凭空臆造。从现有的宋玉作品及有关史料来看，否定宋玉是轻率的，不慎重的；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他的本来面目，肯定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宋玉是无耻文人吗

有关宋玉的身世，史书并无完整的记载，《史记》《汉书》及

《新序》等书上只有几条零星的材料。我们只是大概地知道他曾在楚襄王时做过官，后因被谗失职，晚年写诗述志，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不知所终。他的身世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得不到重用而被谗受压的正直的诗人。

郭沫若在历史剧《屈原》中却把宋玉写成为没有骨气的文人。本来，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著作，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人物形象，人们也并不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一模一样。然而郭先生在《屈原》剧中所塑造的宋玉的形象，是体现了他对宋玉的历史评价的。既然是历史的评价，就应当慎重对待，不能含糊。郭先生说：“我把宋玉写成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或许有人多少会生出异议吧。不过我也不是任意诬蔑。司马迁早就说过：‘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今昔蒲剑·写完五幕剧〈屈原〉之后》）“根据历史上遗留的资料，他实在是没有骨气。”（郭沫若给丁力的信，《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郭先生所引司马迁的话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从这段话里能否得出宋玉是“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的结论呢？我们认为完全不能。司马迁指出宋玉“终莫敢直谏”，意思是屈原敢于直谏，宋玉缺乏这种精神，如此而已。“终莫敢直谏”和“没有骨气”之间根本不能划上等号。《史记》中的人物列传往往把同一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传写，从《伯夷列传》开始都是如此。他们有的是同时代人，有的不是同时代人，但由于彼此命运相关，遭遇相同，性格近似，作者便把他们写在同一个传里。我们似乎找不到把风马牛不相及或截然相反的人物写在一起的例子。可见，司马迁把宋玉附带写在屈原传中，正说明他们之间是

有继承关系的，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而不是互相对立的人物，只不过在列传中，重点写屈原而略写宋玉罢了。

司马迁本人因为“直谏”得罪了汉武帝而遭到不幸，所以他对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及终于被迫自沉深表同情，而对没有“直谏”的宋玉则提出了批评。然而批评毕竟不是否定，司马迁也并没有提供足以否定宋玉的材料。在没有事实作为根据的情况下，怎么能凭这么一句话就否定宋玉呢？更何况“莫敢直谏”，不等于不谏，更不等于阿谀奉迎，没有节操。历史上确有许多敢言直谏之士，如比干、伍子胥等，赢得后人的敬仰；但也有善于以委婉的言辞进行讽谏的人物，同样也得到人们的好评，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便是著名的例子。“直谏”或“讽谏”不过是方式方法上的差异，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国君能采纳正确的意见以改革弊政，举贤授能。因此，能否直谏并非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屈原能对楚怀王直谏，在诗歌中表现“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并且忠于自己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种硬骨头精神确实高尚，值得大书特书。而宋玉虽然没有如屈原一样直谏，却并非不谏，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从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所写的内容来看，宋玉在做官时，也曾劝谏楚襄王改革弊政，举任贤士，因此得罪了当朝权贵，受到了攻击诬陷而终于“失职”的。所谓“失职”，无非两种情况，一是谪官贬职而被罢黜，一是他自请去职。从“失职而志不平”、“蓄怨兮积思”的诗句看，被罢官而失职的可能性更大。失职后，他仍然渴望“一见君兮道余意”，“专思君兮不可化”，还想面见君王陈述己见，请求君王修身自省，以尧舜为榜样（“尧舜皆有

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学习知人善任的齐桓公（“寤威返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但是由于君王昏庸，小人当道（“却骐驎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猛犬唁唁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于是他一再表明自己宁肯冻饿穷困而不愿屈节的高洁情操：“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九辩》中反复吟咏的这些诗句有哪一点是“无耻”、“没有骨气”的表现？我们看不出宋玉有什么奴颜媚骨，相反，却体会到他有强烈的爱憎，高尚的情操和不屈的意志，而这正是与屈原的精神一脉相通的。难怪王逸误认《九辩》是宋玉“闵惜其师忠而被逐”“以述其志”（《楚辞章句》）之作，王夫之则认为“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厄穷为怨尤”（《楚辞通释》）。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九辩》中决没有什么丧失气节的自白，倒是与屈原精神一致的内容。既然《九辩》中找不到任何卑躬阿谀的线索，那么，宋玉是“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又从何说起呢？

郭先生的另一说法是：“再拿传世的宋玉作品来说，如象《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所表现的面貌，实在只是一位帮闲文人”（《今昔蒲剑》）。这是否符合事实呢？

流传为宋玉所作的辞赋有十二篇，《楚辞》中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中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古文苑》中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六篇。在这些作品中，《九辩》最为可靠，是宋玉的代表作；《招魂》则为屈原所作（见《史记·屈原列传》）。《古文苑》成书较晚，其中《舞赋》直接从傅毅《舞赋》杂抄而成，其他五篇伪托的成分也很大（参见游国恩《楚辞概论》和陆侃如《屈原与宋玉》）。对于《文选》中的四篇赋，论者也多以为非宋玉所

作，系汉以后的人伪托(同上)。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但尚无过硬的材料加以否定，同时至今也并无足够的根据证明其必为宋玉所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认为还是存疑为好。这四篇赋流传广，影响深，即令非宋玉所作，毕竟描写了宋玉的为人和性格，暂时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将它们作为宋玉的作品来对待。

这四篇赋中所描写的宋玉，是不是帮闲文人的形象？从表面来看这四篇赋中所写的宋玉乃文学侍从之类，奉命为楚襄王作辞吟赋，似有帮闲之嫌，但我们应根据他侍于楚王身旁时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判断。

刘勰曾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文心雕龙·谐隐》)这里虽然指的是《登徒子好色赋》，然也可用来概括这四篇赋的用意所在。

这四篇赋都贯串了讽谏的精神。它们通过对具体事物的铺叙，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劝谏楚王的用心。对这一点，明代陈第在《屈宋古音义》中有很精辟的见解。关于《登徒子好色赋》，表面看似乎是“写宋玉在楚王面前为自己辩护”。因此，有人认为“宋玉自夸他如何贞洁，显然只是一面之辞，而他攻击登徒子的理由，又显然是颠倒黑白，……使这个登徒子(虚构的人物)蒙了二千多年的不白之冤”(《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一〕第五页)。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这篇赋写登徒子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好色，当楚襄王问宋玉时，宋玉一方面以邻居美女追求自己三年不为所动为例，证明自己并不好色，同时反过来说登徒子好色，因为他同丑陋的妻子生了五个子女。这时楚王身旁的章华大夫用自己曾与一位美女相互爱慕的事说明宋玉确实守礼。作者通过这些描写，最后由章华大夫

直接点出主题：“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陈第指出本赋“假辞以为谏”，“目欲其颜”以下十六个字为“得其本”，其他描写都是“枝叶”，“故不可以枝叶而弃其灵根也”。这就抓住了要害，透过宋玉为自己辩白的现象看到他向楚襄王讽谏的用心——讽谏楚襄王不要沉溺于美色，而要“扬诗守礼”，搞好国事。《文选》李善注就曾点明其主题为“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如果认为这篇赋仅仅写宋玉和登徒子相互攻击，宋玉“诬赖”登徒子好色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是没有真正领会这篇赋的主题，实在是冤枉了宋玉。

《神女赋》描写宋玉梦遇神女，用以打消楚襄王欲效法怀王之梦巫山神女的妄想。陈第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神女赋》也有讽谏意义，只是与《登徒子好色赋》略有不同。他说：“彼之讽在词中，此之讽在词之表。或问何以？曰：楚襄王闻先王之梦巫山女也，徘徊眷顾，亦冀与之遇，玉乃托梦告之，意谓佳丽而不亲，薄怒而不犯，亟去而不可留，……王之妄念可以解矣，是玉之所为讽也。”至于《风赋》，讽谏的意义也很明显。他针对楚襄王的骄奢淫佚，借风为题，描写雌雄两种风的不同现象，君王与庶民的不同生活状况，使襄王知道贫富贵贱生活悬殊，从而知所收敛。所以陈第指出：“人君苟知此意，则加志穷民，又乌能已。故宋玉此赋大有裨于世教也。”这就点出了它的积极意义。《高唐赋》则先描写怀王与巫山女相会的故事，然后极力铺叙高唐之景物，在篇末笔锋一转，直接点明主题，原来是劝戒襄王以国事为重：“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这意思正如陈第指出的：“其末犹有深意，谓求神女与交会，不若用贤人以辅政，其福利为无穷也。”

这四篇赋中，《风赋》与《高唐赋》的讽谏意义较明显，一般容易理解，而《登徒子好色赋》与《神女赋》的讽谏性则不易为人察觉，陈第能体会作者的用心，指明“玉之辞诚婉，而其意诚规”，因此他总的评价是：“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屈原古音义》）李白就曾指出：“宋玉似于屈原”（《上安州李长史书》），王琦注引《襄阳耆旧传》：“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这里所说的相似，恐怕不仅指面貌，也包括思想作风在内，宋玉是有屈原之风的。因此，李商隐《有感》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然宋玉的辞赋是有所为而作，他的为人又有屈原之风，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他是“帮闲文人”呢？应该说，宋玉是一位关心朝政、不满现实、有理想有抱负的正直的诗人。

二、《九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是一篇有一定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好作品。它是宋玉身世遭遇的自述，通过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楚国政治混乱、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黑暗现实。因此它的主题思想是积极的，有社会意义的。

《九辩》写了这样一些内容：当时楚国内政腐败，田园荒芜，人民生活困苦，国力衰竭，显出种种败亡的迹象，诗人对此深深感到忧虑。他叹息道：“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荒秽。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追究其原因，诗人认为是“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归根结蒂，还是顷襄王昏

庸不明，误听谗言，疏远贤臣所造成的。因此诗人愤怒地揭露道：“猛犬唁唁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何泛滥之浮云兮，森壅蔽此明月”，“却骐驎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众蹉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对于谗臣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诗人表示了极度的蔑视。他抱定宗旨，要保持节操，决不苟且取荣，决不同流合污：“见执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远去”，“驥不驟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喂而妄食”，“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面对黑暗的现实，他内心充满矛盾和愁苦，他怨恨君王的不明（“生天地之若过兮，功不成而无效”），叹息时运不佳（“余生之不时”，“余寿之弗将”），很想隐退（“自压桡而学诵”），但是他又怀有一颗热烈的心，对楚王还是满怀希望。他提出了效法先王“仁政”的理想，认为国家的强弱不在城郭是否坚固、甲兵是否锐利，而在于举贤授能，所以他举出尧舜为榜样，希望楚王能象齐桓公一样识拔贤才，这样国事或许尚有可为。可惜这一切仅仅是他的美好愿望而已。由于遭谗失职，他想面见君王陈述己见已属无望（“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謁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眼看岁月如流，老年将至，一切落空，他唯有避世退隐，悲苦以终（“无衣裘以御寒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但是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热烈的心放在君王身上，愿君王择善而从：“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

看起来宋玉思想中儒、道两家的思想都有，既想有所作为，推行“仁政”，而在迫害之下又想“沉滞而不见”，“愿赐不肖之

躯而别离”，避世远引，洁身自好。但从作品的总倾向来看，他似乎念念不忘有所作为，这一点虽不及屈原那么积极，那么强烈，还是有其相似之处的。

《九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幅楚王朝行将没落衰亡的图画，它虽不及《离骚》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采，但总是继《离骚》之后出现的又一首长篇抒情诗，精神有相通之处。可是有些评论者对此视而不见，抹煞《九辩》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说什么“宋玉虽然也对世态有所指责，但他同屈原却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一个是被谗受害，爱国爱民，伟大坚强的战士；一个是流落不遇，自怜自叹，满怀不平的文人；一个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一个从个人的不遇出发，……古人常把屈宋并称，很显然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一九六一年修改本）

难道屈宋之间真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吗？《九辩》的主题是“自怜自叹”吗？只要不是怀有成见，而是客观地看问题，决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认为屈宋之间，在思想性格和创作成就上，只有程度的高低而无性质的不同。的确，《九辩》不如《离骚》那么慷慨昂扬，但统观全篇，这只是支流末节，而不是作品的主流。至于以“个人不遇”来区别两人的异同，这更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两人都是个人不遇，但能否说屈原是“为国为民”，而宋玉仅仅为自己呢？宋玉固然因为个人的“失职”而作“不平”之鸣，难道屈原不正是由于个人的遭谗受害而更加看清朝政日非的吗？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屈、宋，正是因为楚国内政的腐败和外交的失策，才使他们感到痛心。他们都有不与世俗同流、孤高不屈的性格，所以才遭到权贵的猜忌迫害，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他们都热烈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却又

无力实现，所以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期待着有一天能如传说中的吕尚、甯戚那样侥幸遇到明主。但是执迷不悟的楚怀王和昏庸愚昧的顷襄王使他们的理想破灭了，于是他们都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这是他们共同的遭遇，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从性质上加以划分，硬要扬屈抑宋呢！历史上“屈宋”并称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正体现了宋玉对屈原的继承关系，“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王夫之《楚辞通释》）。当然，也应看到他们两人是有差异的，屈原显得更为激烈，愤世嫉俗，“愿从彭咸之所居”（《离骚》），“不毕辞而赴渊”（《惜往日》），自投汨罗；宋玉则忧闷郁结，消极退隐，“愿沉滞而不见”，“自压桡而学诵”，潦倒终身。然而这些毕竟只是量的差异，不是质的不同。屈原是伟大的，值得后人敬仰。他的《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名篇，有着光辉的地位；宋玉也决非反面人物，《九辩》真实地记录了楚王朝没落衰亡的景象，是继《离骚》之后出现的又一长篇，自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

《九辩》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是否定宋玉的人也难以抹煞的。

郑振铎先生指出：“《九辩》是屈原《离骚》和《九章》的亲骨肉。”（《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第十号）他正确地说明了《九辩》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对屈原作品的血缘继承关系。《九辩》正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描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特别是在表现坚贞不屈的性格和对理想的追求上，宋玉是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在《离骚》中，屈原爱憎分明，誓死不向黑暗势力屈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